

# 思想与启蒙

## Table of Contents

堕落的辩证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2
张易: 批马篇 (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谎言 .....	8
张易: 批马篇 (二) 共产主义是贫穷的根源 .....	11
陈嘉映: 教育和洗脑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屏蔽异见 .....	14
1. 辞典上洗脑与教育的区别 .....	14
2. 上述区别的疑点 .....	18
3. 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屏蔽异见 .....	21
4. 暴力是洗脑的“压仓石” .....	26
5. 慎言洗脑 .....	29
陈嘉映: 没有暴力支撑, 洗脑会烟消云散 .....	33
1. 洗脑: 强制灌输+虚假+为洗脑者利益 .....	33
2. 被洗脑者并不知道也不承认他在被洗脑 .....	36
3. 洗脑不允许你接受其他任何东西 .....	39
4. 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报复, 所有洗脑手段都不会奏效 .....	41
大陆网民讨论教育与洗脑的区别暗示不满 .....	46
言论自由, 宣传还是洗脑? .....	48
1. 大规模洗脑是宣传的极端手段 .....	48
2. 中美主旋律宣传的区别 .....	49
3. 言论自由的三重含义, 中美之别 .....	51
4. 管理言论有没有比程序正义更好的原则 .....	54
5. 这 30 年来中国的言论自由进步了吗? .....	57
林达: 言论自由的目的并非为追求真理 .....	62

# 堕落的辩证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文\南方在野(2005-12-9)

## 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堕落

当下一些主流用语,貌似辩证唯物主义,实则机械唯物主义。

例如这一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怎么看怎么别扭。为什么要用“决定”一词呢?有一些人说:“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在偷换概念。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不错的,但“基础”与“决定”有着本质的区别,岂能混为一谈?

“决定”一词,不仅带有“某一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的意思,还认为“客观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向发展变化”(见商务印务馆《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第688页)。这一词语的运用,过分夸大了经济基础对人类的制约与束缚,实际上否认了在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等“上层建筑”创造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降低了人的价值与尊严,陷入了庸俗的机械唯物主义,造成了人们在社会劳动中主观上的消极。

这种用语学上的缺陷是比较糟糕的。一些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官僚老爷,总是频频引用这一句话做口号宣言,用作为拖延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他们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言下之意,中国的“经济基础”目前是落后的,所以“上层建筑”就理所当然的也应该落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按照他们的谬论,只需要“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等到“经济基础”上去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

上层建筑就会不请自来，不用费什么吹灰之力。——实在是一副典型的愚民嘴脸。

如果善良的人们真的相信了执政者阶层的这一套骗术，那将是万分可悲的。人的价值与尊严决不在于被动的适应与创造物质资料，更体现在能动性的创造精神财富与政治文明，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将人从物质、精神、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广义社会分工，将人的社会劳动划分为物质劳动（创造物质资料的劳动）、精神劳动（创造精神财富的劳动）、政治劳动（创造政治文明的劳动），相应的产生了物质劳动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执政者阶层。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生与进化，绝对不是物质劳动者阶层的单独前行，而实际上是这三种社会阶层群体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共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结果。片面强调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其本质是要推卸知识分子阶层和执政者阶层的社会责任，美化知识分子阶层与执政者阶层的懒惰、怯懦与无能。

社会文明的产生与进化，关键在于充分承认人的价值与尊严，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脱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上层建筑。举例说明，直到 19 世纪上半叶，亚洲、非洲、美洲还存在广大的部落地区。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千千万万的土著居民世代生息、劳动、繁衍。那时当地出现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社会分工，私有财产也已产生，农耕物质文明有了相当发展。但是，这些族群缺乏专门的精神劳动与政治劳动的能动性，精神财富与政治文明的发展严重迟滞，当西方工业化强国将他们所在的土地与资源视为“无主地”而“先占”之时，他们还只是部落组织，尚未建成国家。

再观察亚洲四小龙，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力水平位于同一档次，“经济基础”也大致相当，但“上层建筑”却迥然相异。韩国

台湾近十几年来勇于创新 and 践行民主体制，行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渐入佳境。但反观新加坡香港，执政者阶层出于各种借口漠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行集权主义权威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处于所谓的“渐进”状态，究竟执政者在等待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呢？我看这是万分悲哀的，一样的经济基础却“决定”了不一样的上层建筑，不知道执政者阶层又要拿出什么样的国情来做盾牌。

在今天的中国，民主体制的践行是只需要执政者阶层的勇气和智慧的问题，与经济基础无关。难道今天中国的经济基础竟比不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200 多年前刚刚建国的水平？这一些国家在建国之始就大胆采用民主体制，结果 200 多年后的今天，将我们国家远远抛在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力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个不虚心学习的民族，将不能避免自我堕落的命运。如果时至今天我们还在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此作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说辞，那么除了革命，还有什么可以挽救执政者阶层的自私与懦弱？

## 二、以毒攻毒：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经济基础”是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三个方面的总和。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最主要的，决定了经济基础的其他方面。

2. “上层建筑”是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范畴，指社会的政治、法律、文艺、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些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总和。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是两个术语、同一内容。相对于生产力而言叫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叫经济基础。人类社会有三个基本层次：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马克思所言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论，也就是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上层建筑。真的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上层建筑吗？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上层建筑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普遍的现实存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产党运用国家政权（国家政权属于上层建筑），令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确立。这一次创建实验由于未尊重人性，不能解放人，没有调动人民劳动的积极性而失败。但这一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典型事例的存在，充分说明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往往能决定经济基础。

任何一次革命性转变，都要先发动政治劳动精神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创建适宜的上层建筑，解放人性，脱下原本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政治与精神的枷锁，然后方可进一步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作用，从而解放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从而解放生产力，不是一种狂热的随心所欲的想象，这种实验成功与否就看它能否解放人性于牢笼之中，是否能提高劳动人民劳动的积极性。

明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就能够知道，西方工业强国当年拿着洋枪洋炮侵略弱小民族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依然在农耕文明中爬行？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早在明朝

中后期就出现于中华大地。但早期中国工业文明的曙光却臣服于封建集权式上层建筑的淫威，历经两三百年迟迟躲在历史舞台的幕后苟延残喘。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是腐朽的上层建筑决定了腐朽的经济基础。南方在野大胆推测，如果没有全球化的到来，若关起门来，封建集权的保护下中国沿着农耕文明的道路再爬行个两千年绝对不成问题。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产的决定作用究竟有多大？比较一下朝鲜与韩国，我们就会恍然大悟，看着今天朝鲜的独裁者说“要探索符合朝鲜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简直是一幕丑剧。

当我们讲“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我们总是由于用语不当而片面化。而我们忘记了先要富强经济，必先富裕头脑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与地区（如日本德国），越是经济比较繁荣，越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与地区（如非洲国家、中东地区），越是经济比较落后。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等省实现了“零资源”式的经济腾飞，而资源最丰富的中国西部，让人触目惊心看到贫穷与落后。究竟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呢？说“穷则思变”是物质决定了意识，未免有些牵强。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与地区，人们居安思危，发奋图强，竞争意识强，比较勤劳，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于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实现了“零资源”式的经济腾飞。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与地区，人们对环境的依赖性强，心理松懈，主观能动性没有被调动起来，于是贫穷与落后。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意识决定了物质，而不是物质决定了意识。

战国时期的秦国，地处西方，资源匮乏，人烟稀少。在七雄之中原本是最贫弱的。正是国家的贫弱，激发了国君的忧患意识，于



是起用商鞅，锐意变法，勇气与决心使秦国的变法在七雄之中最为彻底，成效也最大，终于富国强兵，一统天下。——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不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力；不是物质决定了意识，而是意识决定了物质。

有人说，你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物质对意识的约束作用巨大。南方在野“狡辩”道：南方的“意识决定物质”“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都是辩证的，不是片面的。你有没有兴趣听南方来辩证一下？

南方在野的论述，不知有没有起到“以毒攻毒”的作用。

## 张易：批马篇（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谎言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种糊涂不清、混淆是非、煽动仇恨、吹崇暴力、充满黑色能量的魔性学说。它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苦痛，这是有目共睹的。《九评》出现，揭露出了它的本质，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不过，一些善良的民众，依然被它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迷惑，觉得有“道理”。

在古老的中国，上古流传下来的文化，虽然倍受中共的毁坏和摧残，但有一些还是顽强的存活了下来，比如易经等。这里运用相关文化的原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大家看一看，如何？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他不断的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古以来，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不断的经济发展，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形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到封建主义社会，进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社会的规律。

这理论的迷惑性很强。从人类社会来说，经济水准在不断的发展，而社会形式也在不断的变化。如果说经济水平决定相应的社会形式，貌似也有道理。不过，如果我们对照一下现实的话，看出了问题。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朝鲜半岛，相同的经济水准却建立了不同的国家制度。南边韩国是民主国家（资本主义），而北边朝鲜是共产主义国家；台湾和大陆一水之隔，也是如此。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在现代社会，世界上相同的经济基础，经济、政治等制度不也是千姿百态的吗？这又是什么原因？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很正常，也是符合社会原理的。经济是一种基础，而它并不能决定产生什么性质的政权。社会制度是由政权建立的。如果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民主国家政权，自然是民主制度。

换句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不了国家的制度；不同的政权“产生”了相应的国家的制度。注意，这里是产生，不是决定。

有人会问，那么如何解释经济基础和政治、经济等制度的关系呢？

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认为，政治、经济等制度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或者说，是由“天意”、“道”等所决定的。从人类社会这个层面上看，是由许多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经济基础对政治、经济等制度有刺激、支配和控制等作用，但绝对不是决定。而制度本身是由政权产生，但也受到社会文化、环境、民众的具体构成、素质、需求和欲望等等因素影响。

比如，毛泽东在中国搞的“计划经济”，饿死了几千万人，大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的经济基础自然导致了后来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经济制度虽然变化了，但政治制度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马克思也看到了经济和社会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和联系，但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是偏激、片面和充满谬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本质上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机械推导。说到底是为了他的“社会五阶段论”等一系列的谎言打基础的。

总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谎言，并不难看穿，但共产国家的教育是运用暴力和谎言在封闭的环境下全方位的洗脑，要想明白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大家能看一看《九评》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应该大有裨益。

## 张易：批马篇（二）共产主义是贫穷的根源

一百多年前，“大同社会”的大旗被共产主义的信奉者祭起，迷惑了世界上众多的人。有不少人中毒很深，如醉如痴，就是为此付出了生命，也没有放弃所谓的“理想”。

在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有真正富强繁荣的吗？没有。咱们先不提当年大陆饿死几千人的历史，就是现在的“宇宙强国”朝鲜也经常发生饥荒。其实，共产主义是贫穷的根源。“共产主义”实施的越彻底，就越贫穷。朝鲜声称中国大陆是“修正”的共产主义，不是正宗的。如果没有这个“修正”，中国现在也要闹饥荒。

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是贫穷的根源呢？作者在这里作一个粗略的分析。

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人的富贵不是没有来由的，相信天意、风水、积德和修行等等。作为一个人来说，要尊敬天地，积德行善，提高自己的道德等等，才能期富贵。而共产主义的党文化，鼓吹战天斗地，败坏民众的道德，要把正常人变异成“非人”。正因如此，才成了贫穷的根源。

其次，我们运用相关社会学原理分析如下：

（一）人类社会是在许多系统相互协调作用下运行，它们之间的力量要大致保持平衡，才能正常运行。而共产主义社会是邪恶的极权结构，对人类社会的控制达到了极致，打破了人类社会的平衡。

也就是说,它的权力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畸形的庞大,危害了经济的发展。

(二) 上面从大的角度上而言的,下面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具体分析。共产极权社会的管理机构和人员特别的庞大,消耗的社会财富数目巨大,经常超出社会的承受力。共产主义所形成的社会制度也非常严苛,不符合社会学的规律,甚至是违背人性和残暴的。这些制度常常无故剥夺民众的自由和财产,无视民众的正常需求和欲望,不把民众当人看待,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自然削弱。

比如,一九四九年后,大陆建立了二元管理系统。严格的各种管理制度,把工厂的工人圈起来当成工奴,把农民拴起来当农奴。

(三) 众所周知,社会的财富关键在于所有权。所谓的“共产”,就是共产党拥有了财产的所有权,而绝大多数的民众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当年大陆大饥荒发生的时候,农民们没有拥有一点点私地,连他们生火做饭的铁锅也被砸烂,“大炼钢铁”了。就是在今天,大陆的百姓也没有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是所谓的“承包经营权”、“转包权”等。

社会财富的所有权的各项权能没有被自由和充分的发挥,民众如何生产和创造财富?

(四) 共产党还采用和发展了历史上非常邪恶的统治民众的方法。把民众视为自己的仇敌,抢夺民众的财富的利益。认为民众衰弱,则国家(实际共产政权)强大;而人民强大,则国家(共产政

权) 则必然衰弱。于是，为了共产政权的强大，实施了“愚民、辱民，贫民，弱民”的邪恶政策。

这些政策使民众愚昧，成为共产党的“顺民”，也彻底的成了“贫民”。正是这样拼命的掠夺，没有给农民留下救命的口粮，所以才人为造就了上个世纪的大饥荒。也正是这样，江泽民才把后来的“下岗工人”逼到了绝境。

换句话说，即使共产国家的馅饼再大，分到大部分民众手里，也是所剩无几了。

这里提醒大家，在共产国家，共产党时常煽动仇恨，挑起民众的矛盾，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斥着自私、仇恨和冷漠，成为一盘散沙，易于管理。这根本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了更多的社会混乱。

(五) 共产国家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和管理，采用了闭关锁国的模式，本身不利于经济发展。共产主义作为一种魔性的歪理邪说，没有封闭的环境，高压的政策，血腥的暴力，是很难被洗脑的，所以闭关锁国是必然的。

以上所述，是很简略地说一说，具体分析起来，还能写很多的。关于中共的虚假繁荣，大陆民众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处不多说了。多读一读大纪元的社论，想来大家一定会心明如镜的。

## 陈嘉映：教育和洗脑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屏蔽异见

陈嘉映：出生于上海，文化大革命时，到内蒙古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德语。1983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其后赴欧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国，翌年重返北京大学执教。200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紫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访问教授。

教育的理想是举一反三，我有自己的理解和见解，才能举一反三；洗脑则在于消除你的独立见解，你所接受的东西里不包含未来自主生长的种子。

### 1. 辞典上洗脑与教育的区别

教育是教育，洗脑是洗脑，把教育混同于洗脑肯定是不对的。不过，两者到底区别何在，也不是那么容易想清楚。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近世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传统社会，该教给学生什么东西，分歧较少，因此，灌输不灌输就不是那么突出的问题。

现在，多元价值、多元文化的理念被广泛接受，个人的自由选择得到推崇，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虽然过去的统治者宣扬的那一套意识形态也有洗脑的成分，但只到了最近百十年，世界上的洗脑机器被开发得越来越强大。所以说，教育和洗脑之间的张力，今天格外凸显。



让我们从洗脑说起。“洗脑”这个说法大家都熟悉，每个人都可以列举很多例子，从纳粹德国说到传销，从商家的宣传到不同的政治主张，怒斥那些施行洗脑的坏蛋，嘲笑那些被洗脑的人，抨击可以很过瘾，大家听得也开心。不过，抨击嘲笑太容易了，倒可能妨碍我们思考。我今天想说的倒是，洗脑的问题有点儿复杂，值得我们多加思考。

说到洗脑，大多数同学想必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本小说，不过，离开现实并不远。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所谓“四人帮”，他们建造起强大的宣传机器，这台机器编造历史，歪曲现实，日夜不停地给我们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民生活得最幸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

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现在回顾当时，我们会说当时自己被洗脑了。听说，我们邻邦朝鲜的民众今天还是这么想的；我们会说，那是他们被洗脑了。



仅仅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为了能够洗脑成功，  
同时还得屏蔽掉其他的信息，不允许异见出现，更不允许它传播。  
所以，这台宣传机器还要跟严格的审查制度配套。很显然，如果民

众有多种信息渠道，获得官方宣传之外的不同信息，相反的信息，他们就可以比较、甄别，就有可能怀疑被灌输的画面。

如果有人表达了异见怎么办？可以动用专政机器把他抓起来，或者，干脆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掉。1966年有个叫做遇罗克的青年，他写了一篇《出身论》，反对当时的一幅红色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就被抓起来，最后被枪毙了。



遇罗克所讲的，现在只是很普通的看法，再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正式的官方立场，可是，遇罗克还是犯忌了，因为他用自己的脑子想事儿，没有完全依照官方的口径说话，发出了一点点独立的声音。我想说的是，在宣传机器和审查机制背后，还要有赤裸裸的暴力。遇罗克是个可敬的青年，当然，他只是千千万万例子中的一个，当时，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而被逮捕，甚至被残酷杀害。

从遇罗克的例子看，洗脑包括三个要素：灌输、查禁、暴力。不过，从一个例子做概括，肯定是太草率了。例如，洗脑总有暴力支持吗？我们可以想一想传销，想一想集体自杀的圣殿教教徒，想一想自杀式袭击者，会觉得洗脑不一定总有暴力支持——那些欧洲中产阶级的子弟被洗了脑，跑去参加 ISIS(伊斯兰国组织)，似乎并

没有谁胁迫他。

那让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界定洗脑的。在辞典里在网上可以找到对洗脑的多种多样的定义。有些内容跟我上面的概括重叠，有的方面不一样，例如，这些定义都没有提到暴力支持。这里不重复这些定义，归纳下来，大致意思是：强行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有的说法更周全，加上了“为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给别人强行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这个定义里面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灌输，一个是虚假，最后一个是为了洗脑者自己的利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教育和洗脑的区别。我们不妨对照这三条来展开我们的讨论。

先说虚假。洗脑要灌输给我们的，是虚假的观念而不是真理。教育的目的则相反，教育是要让我们获得真理。这是洗脑和教育的第一层区别。这好像是很重要的一条——要是洗脑的结果是给我脑子里装上了好多真理，即使用了点儿强制，洗脑似乎也还是一件好事。是不是这样，我后面还会谈到。

再说第二条，强行灌输。洗脑要把一套虚假观念灌输到我们脑子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开动宣传机器，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宣传机器不停运转。大家都听说过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教育则不同，教育不是教师强加给学生的，学生是自愿自主的。有些论者甚至认为，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自由的交流。这是洗脑和教育的又一层区别。

第三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纳粹的宣传为的不是德国人民的利益，为的是纳粹党自己的利益。再以传销为例，他给学员灌输

传销多么多么有利可图，谁有利可图？首先是他自己，他发展了下线，他自己先就赚上了一笔，你会不会赚到，那其实不是他关心的事。

教育就不是这样，我们教育自家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学生，当然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学生好。这是洗脑和教育的第三层区别。如果你接受我教给你的东西，我就明显会得到好处，你显然有理由对这套东西保持警惕。

丈夫教妻子三从四德，妻子信了，从此丈夫在外面吃喝嫖赌，妻子低眉顺眼不敢说个不字。这时候，妻子很有理由怀疑“三从四德”这套道理是不是一套好道理。我不是说女人贤惠不好，不是说国家利益不重要，但显然得有点儿什么跟这些东西配套才对，例如，国家利益重要，另一方面，个人权利也重要。

## 2. 上述区别的疑点

虚假，灌输，为了洗脑者自己的利益，从这三个方面看，的确，教育都不同于洗脑。不过，我们要是多想一步，这三种区别，每一种区别都不是那么分明，都还有疑点。

就说强行灌输吧。这里的疑点是：一方面，洗脑不一定都靠强制灌输，另一方面，教育也有强行灌输的一面。先从教育这方面说。我们现在实行高中以下义务教育，这同时也是强制教育，家长不让孩子受教育是犯法的。

教育也并不总是讲道理，很多东西直接就要求学生背下来。老师要求学生背这首诗，背这篇课文，这不是灌输吗？历史课、政治课，灌输的成分就更多些。灌输背后都有强制，背不下来就扣分，这就是一种强制手段。

想想我们怎样教孩子弹琴，强制就更明显了——你跟孩子说，你要么坐在这儿好好弹琴，要么上院子里要去，十个孩子十个到院子里要去。有些论者主张真正的教育不可以是灌输，而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平等的、自由的交流。这种主张，显得开明，而且政治上正确。

我当然十分赞成我们的教育应该减少灌输的部分，增加自由探讨的部分，到大学阶段，尤其要更多的自由探讨。不过，教育不可能等同于自由交流。小学、中学就不去说它了，即使到了大学，师生之间也不完全是在平等交流。不怕俗气，要是平等交流，就不该让学生付学费，而老师拿一份工资。

从洗脑一方面说，它似乎也不一定都靠强行灌输。我们刚才说到一些欧洲青年，听了 ISIS 的一套宣传，几千人跑去参加“圣战”，没有人强迫他，他们自愿跑过去。甚至说不上灌输，他们所在社会，ISIS 那一套不是主流，他们自己却千方百计去了解。

真实和虚假则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们也许会说，我们把四人帮那一套叫作洗脑，是因为它要灌输给我们的是一套错误或者歪曲的观念，而我们所说的教育，比如说我们教给学生代数公式，教给他

们唐诗宋词，教他们弹钢琴，教他们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服从党中央，我们是在教一些正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大家已经听出来了，这个想法没能把我们带得很远。且不说家长会给孩子讲圣诞老人的故事，会告诉孩子她是从面包树上生出来的。

这里的大问题是：应该由谁来确定真假好坏？张春桥也许会说，而且他也许真的相信：咱们都应该热爱江青同志，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伊斯兰国的头领会说，他们也许真的认为：把全世界都纳入真主的统辖是最最正确的方向。你也许会说，问题不在于他怎么认为，而在于客观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美好的。

但怎么区分什么客观为真什么客观为假，应该由谁来区分？这些问题太大，这里实在无法展开来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坚持认为，基督教的一整套信仰和学说都是虚假的，我们是否因此就能认定千百万人两千年来的基督教信仰都是洗脑的结果？

最后，再来看看“为谁的利益”这件事。我刚才举了些例子来说明，的确，如果你为自己得到好处来教我，我就有理由怀疑你在洗脑。我们教育自家的孩子，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至少首先或主要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些“教育者”的利益。

但 ISIS 的洗脑就只是为了拉登们的利益吗？你恐怕大概不能这么论证。你说，自杀式袭击者被洗脑了，你看，他去袭击，自己死掉了，得到好处的是拉登他们。且不说拉登们所冒的风险一点儿都不少，而且，你还会想到狼牙山五壮士，想到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



牺牲的成千上万国军烈士。你要是把爱国主义教育、舍己救人的教育都说成洗脑，那么，除了市侩哲学就没有什么不是洗脑了。

### 3.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屏蔽异见

我不是说，洗脑和教育没有区别，而是说，要弄清这些区别，有可能比我们一开始想的要麻烦一些。我们现在试着再往下想一想。我觉得，要想得更深入些，需要把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一些因素引进来，要把屏蔽异见、暴力支持这些因素引进来。

我们说到，教育难免有灌输的成分，不过，老师虽然规定了你必须学什么东西，他通常却不禁止除此之外你学点儿什么。换句话说，他并不屏蔽相反信息和异见，不禁止你去参照比较，也不禁止你去琢磨这些东西背后的道理。你必须把这首诗背下来，但你去读别的诗，他不管；不管你懂不懂，你必须背下这个公式，但你偏要自己去把这个公式推演出来，老师并不禁止，多半还会鼓励。

洗脑就不同了。我们说传销班是洗脑，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力图屏蔽不同信息。你一进了传销班，多半会被封闭起来，不允许自由出入，还把手机没收，不让你自由通话。上面我们讲到，专事灌输的宣传机器总和审查制度配套的。

我们曾问道，爱国主义教育对谁有好处？这个问题也跟一个社会的信息自由程度相关。二战期间，美国和日本都提倡爱国主义，美国人和日本人都都很爱国。两相比较，美国人有相对较多的自由

来接触各方各面的信息，他们相对比较容易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有较多的自由了解到反战的思想，等等，不像在日本那种军国主义环境里，掩盖战争的起因和实情，禁止谈论政府的决定，就此而言，美国的爱国主义观念里，洗脑的成分就少一些。

我上面说到，用真实还是虚假来区分教育还是洗脑不是最好的角度。的确，一上来就争论谁是真的谁是好的，难免一头雾水。比较看得清楚的区分，在于是否屏蔽异见，而这恰恰是区分真假的一个先决条件。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一开始难免被灌输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是真是假是好是坏，我们一开始不怎么清楚。但若我们有获取信息的自由，能够拿其他的东西来跟教给我们的东西做比较，我们就会慢慢培养起自己的判断力。

大家都知道，教小学生学东西，强制的成分多一点，而且，不少东西，我们并不讲解背后的道理，就让他们死记硬背，随着孩子长大，强制因素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依靠讲道理。为什么？很简单，他们长大了，懂道理了，有了自己的判断力，而且还能够反过头来判断一开始教给自己的那些东西是真是假是好是坏。我们不妨把这一点概括为：回顾始知真假。

是教育还是洗脑，我们往往不能只看当下是否带有强制来确定。等孩子长大了，知道的更多，眼界更开阔了，自己对好坏对错自己有了良好的判断力，反过来看当年，他会认可当时老师给他选的诗是比较好的，或者比较适合他当时这个年龄阅读的。他会看到教育和灌输之间的区别。他回过头看学钢琴的过程，哪怕记得其中包含相当的强制，他也多半会理解这种强制。他这时候早知道根本没有圣诞老人送礼物这回事，但他不会把这些当成欺骗。

洗脑的情况就不同了——被洗脑的人一旦能够判断真伪，他就会感到自己当年受了欺骗，他不会感谢当年给他灌输东西的教师，甚至不能原谅他。



从教师一方面来说，他虽然有一套他自己的课程，但他并不限制学生接触别的东西，这恰恰表明他自信他所教的是正确的知识、正当的道理。实际上，这种自信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不禁止学生接触不同的东西，相反的东西，反倒鼓励学生时不时跳出他所教的东西。洗脑者却没有这份自信，所以他需要禁止你接触与他不同的那些东西。

当然，回顾始知真假只有部分的解释力。你教孩子吃辣，他也许慢慢就喜欢吃辣了，教一个人喝酒，他慢慢就爱喝酒了。钢琴和数学也是一样，实际上，如果他将来成了数学家，钢琴家，一定是他后来慢慢爱上这个行当了。这是从正面说，如果从反面想，你教给他什么他就爱上什么，正是洗脑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圣殿教徒直到自杀前的一刻，可能仍然相信他的人生受到了正确的指引。

与此类似的还有大家都听说过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明明是受害者，结果他会爱上迫害者。你看着他受迫害好悲惨，但他即使了解到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仍然不觉得他那是悲惨。在极端情况下，事情的确会糟糕到无法挽回。

回顾始知真假好坏，也关联到“对谁有益”的问题。学钢琴是非常艰苦的过程，也许没有例外，学钢琴的孩子在小时候都相当抵触，但你长大以后，弹得一手好钢琴，成了郎朗了，这时候你会感谢逼你弹琴的家长 and 严格要求你的钢琴教师。即使你没有在弹琴的路上走下去，你也能理解家长为什么让你学琴，你多半也能从学琴的经历中获得很多益处，例如培养了自己的乐感。

加入传销团伙的学徒，到头来大多数都发现自己什么好处都没得到。事后回顾，纳粹主义对德国人民并无好处。

不过，“对谁有益”这个问题还有更深的内容。从传销的例子看，灌输观念的一方明显得了好处，被灌输的一方明显吃了亏。但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谁受益都这么一清二楚。其中的一个缘故是，人生的好不是一种完全客观的东西。你女儿想报哲学专业，你坚持让她上商科，你认为学商科对她有好处。她上大学了，谈了个男朋友，你看了看，这男生不像是将来能挣大钱的，坚持让女儿跟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谈朋友。当然，你是为了孩子好。而且，到头来，你可能的确是对的，我们家长是过来人，我们知道，人在年轻时候比较浪漫，容易想入非非，等到结婚生子，就变得“现实”了，那时候，她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好，学商科对她更好，另一个男人更适

合她，等等。

就算你是对的，就算女儿再过十年以后会发现你当时是对的，你现在是不是就应该强扭着她照你的想法去做，仍然是个问题。你为我好，而且你是对的，但我并不因此就该事事照你说的去做。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也是我的好的一部分。私人生活是这样，公众生活也是这样。即使我们有一个关心民众福利的政府，即使这个政府的某个举措是对的，这些仍然不够，政府还有责任，让民众认识到它的这些举措是对的。

前面曾问道，要是洗脑的结果是给我脑子里装上了好多真理，洗脑会不会是件好事？不是。我是要真理，但我不只是要占有真理，我要的是追求真理从而认识真理，要的是我自己去逐步认识真理这样一个过程。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你自己并不追求真理，那么，即使真理落到你手里，你也不知道它是真理。

教育的理想是举一反三，我有自己的理解和见解，才能举一反三；洗脑则在于消除你的独立见解，你所接受的东西里不包含未来自主生长的种子。

教育里有一部分，当然是长辈和老师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把他们认为正确的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然而，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力，培养他的自由人格，希望他成熟起来，能够在他自己的时代里，依他自己的性情，去获得他自己的好，去过上一种有充实意义的生活。至于什么是他的有意义

的生活，则并不由教育者决定。依我看，这是教育和洗脑最根本的区别。

世上有种种可能的生活，其中只有一种，是我选择的，或是我被抛入的，但我并不是被封闭在这种生活里面，我有所领悟地过着这对我唯一的生活。这种生活因此富有意义。这种生活富有意义，当然不见得在于我从这种生活捞够了好处。它富有意义，蛮可以是因为它富有创造性，蛮可以是因为它为别人带来的好处，蛮可以是，像特雷莎修女那样，因为它充满了对不幸的悲悯。在极端情况下，也可以是，因为我为我钟爱的人，或为我的民族，献出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修道士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并因此而幸福，这跟朝鲜人民的幸福感不同，不是因为他不了解在这种生活之外还有别种幸福，一旦他有了别种生活的可能，就立刻去过别一种生活。为国捐躯的壮士宁愿牺牲自己，不是因为他被洗脑了，而是因为他若临阵脱逃，他就否定了自己生活一场的意义。

#### 4.暴力是洗脑的“压仓石”

一开始，洗脑的几个要素我们是分开来讨论的，但到后来，我们逐渐看到，是否灌输，真实与虚假，对谁有好处，屏蔽信息，以及我们还没有讲到的一些因素，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例如，我前面说到，要进行洗脑，屏蔽异见是很重要的，但是，若无其他因素协助，屏蔽异见的作用其实也有限。



上世纪50年代，有过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你们可能读过杨绛的《洗澡》，对，当时不叫洗脑，叫洗澡。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眼界并不十分闭塞，好多知识分子从前读过好多别样的书，了解别样的世界，不少还是从美国欧洲回来的。但思想改造运动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部分是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总体上主动参与了这场改造运动。

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前辈，读过不少回忆录什么的，知道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确抱有某种真诚，主动投入这场运动，后来也多多少少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种改造。早在前面几十年，受到种种思潮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深刻的自我怀疑，存着想要融入时代潮流、想要接近工农和广大人民的念头。



不过，自我改造的真诚愿望显然不是故事的全部。在思想背后，还有好多实实在在的手段。说得轻，你改造得好，你当了教授，当了主任，提了工资，收到高级会议的邀请信，你改造得不好就得不到这些。说得重一点呢，你改造得很不好，你拒绝改造，那你就会

得到另一些东西，啥东西呢？我无须多说。

没有强权做靠山的主张，即使流于喋喋不休的宣传，也很难把它说成是洗脑。祥林嫂喋喋不休，是让人烦，但没人说她在给我们洗脑。单单宣传，还远远够不上洗脑。前面提到过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恐怕这本身就是一句谎言，因为它不提纳粹暴力机器的支持，没有这种暴力支持，那套宣传即使再重复几千遍恐怕也难变成“真理”。

宣传和屏蔽异见是洗脑的明面，背面得有暴力支持。在洗脑过程里，无论出场不出场，暴力往往起到“压仓石”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到洗脑，我们首先会把它和强权连在一起。

离开暴力，洗脑很难成功，即使成功，一旦暴力胁迫消失或减轻，洗脑的效果往往很快就挥发了。刀尔登最近出了一本小集子，叫做“亦摇亦点头”，其中一个反复提到的观察是，他小时候，铺天盖地都是同一种意识形态，可是后来读到一点点相反的或只不过是不同的东西，脑子里原来那套观念挺快就瓦解了。

你也许会说，刀尔登这个人比较聪明，智商比常人高一点儿。那就拿我自己举例吧。我比刀尔登大十几岁，在那套意识形态的环境里待的时间更长，接触到不同的东西更晚，但基本情况也差不了很多。例如，我从小听到的全部是斯大林怎么怎么英明伟大，可是才读了一本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三次谈话》，原来那种观念就动摇了，一本不见经传的小书，怎么就让我开始信吉拉斯了，不信宣

传了那么多年的东西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洗脑机制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暴力。宣传、屏蔽、被洗脑者自己的愿望，这些都是真实的因素。但我怀疑，去掉了暴力的因素，我们就很难全面地刻画洗脑机制。而且，暴力并非只在外部起作用，它还会跟机制里的其他因素产生化合反应。我们刚才讲到自我改造的真诚愿望，也许，只有联系于暴力才能更深入地分析这种真诚。

我们并非所有时候都能把真诚与被迫、主动和被动分得清清楚楚。有时候，我被胁迫去做一件事，我讨厌人家胁迫我，我恨别人胁迫我，但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也许会让自己觉得，其实我不是被胁迫的，我是自愿去做的。不说别的，这里涉及我的自尊，自愿去做一件事情比较多一点尊严，被人胁迫去做一件事情，尊严就少一点。我不想再在这个方向上分析下去了，人性中有很多让人不忍深思的东西。

## 5. 慎言洗脑

我们从好几个方面谈了谈教育和洗脑的区别。最后我还想说一说另外一个区别，那就是，一个接受教育的人，通常知道自己在接受教育，他也承认自己在受教育，但一个被洗脑的人，却不知道自己被洗脑，也不承认他是被洗脑。我们说朝鲜人民被洗脑了，这是我们的说法，不是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自己恰恰视之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他认识到自己被洗脑了，他差不多已经脱离了被

洗脑的状态，就像梦醒了才知道自己在做梦。

被洗脑的人不觉得自己被洗脑，洗脑这个说法是从外部加给他的，由此生出一种有趣的现象——你指斥他被洗脑的时候，他可能反过来指斥说，你这么认为，是因为你自己被洗脑了。

一般来说，自由主义反对专制，主张自由教育，而洗脑通常发生在专制政体下面，由此，自由主义者通常对洗脑更敏感，对专制政府的洗脑机器更加警惕。但现在有人反过来指斥自由主义——你们反复宣讲自由主义主张，这也是一种灌输，这些主张本身也是被洗脑的结果，被西方意识形态洗了脑。这样说下去，只要有不同看法，就是有一方被洗了脑，或者干脆双方都被洗了脑。那当然就说不上教育和洗脑有什么区别了。

自由主义者像所有主义者一样，有时要宣传自己的主张，宣传起来，难免有点儿喋喋不休。我们每个人都难免想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去影响别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些人有点儿教条，喜欢说教，老想去影响别人。但影响别人不等于洗脑。

按照前面的分析，洗脑还要依靠屏蔽异见、暴力支持等多种因素。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诉求就是言论自由，信息流通自由。而且，从我们的现实情况看，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个社会处于边缘地位，并没有禁止我们了解其他道理的实力，更靠不上暴力。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很难把自由主义的宣传说成洗脑。

我们说纳粹政府对民众洗脑，因为它掌握着宣传机器，它有力量控制资讯，它有钱操纵舆论，在这一切背后，它还有实实在在的武力。把所有想影响别人的活动都称作洗脑，就抹杀了这层根本的区别。



如果自由主义者宣传自己的思想不算洗脑，那么，男尊女卑观念呢？种族主义呢？支持奴隶制的那些观念呢？很多观念，在很长时期内是主流观念，但在我们看来，它们是错误的，甚至是恶劣的。但当时的人们并不是因为被洗了脑才持有那些观念。

总的说来，这样的观念都与当时的特定生活形态相联系，与当时人们对其他事物的理解方式相联系，而正是由于这样的联系，有些观念不管怎么错误，都不能说是洗脑的结果。谁又敢说我们自己的观念那么正确，不会被后人视作愚蠢乃至恶劣？

不消说，我们无法在传播某种怪异观念和洗脑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就拿圣殿教来说吧，它好像不是靠暴力支撑的，不过，它的确采用屏蔽异见之类的方式，像传销活动一样，这种封闭性也多多少少要依赖暴力。在公开说理的环境中，它的洗脑力量就会减弱。我不是说公开说理总能说服圣殿教的信徒，但若如此，我们就需要更全面地研究圣殿教这类现象，也许，圣殿教的教义，并不只是一派荒唐，其中也有值得我们思考之处。



总的说来，我建议我们要慎用“洗脑”这个词。不要因为别人的立场和做法显得荒唐就指斥他被洗脑了。朝鲜民众以为他们那种穷困的日子是幸福生活，或者，人生最高的幸福就是信仰金正恩，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洗脑的结果，因为在朝鲜，大多数外部信息是被屏蔽的，支持这种屏蔽的是巨大的暴力。但一位修道士认为，有汽车有洋房算不上幸福，真正幸福的是一心事主，甘心情愿去过我们都不愿去过的艰苦生活，虽然他的想法和做法跟我们绝大多数人不一样，你也不能说他是被洗脑。

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自杀式袭击者。当然，我同样认为自杀式袭击者错误，愚蠢，罪恶，这里大概有一些洗脑的成分，但我个人不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能用“洗脑”一言蔽之，还要探究他们自己所具的信仰，所持信的道理。我们需要找出他持信的道理在哪里，指出他认之为道理的东西其实不合道理。你也许不能说服他，但至少，你自己变得更懂道理了，更不容易被人洗脑了。

径直把什么什么说成“洗脑”，这来得太容易了，往往妨碍我们对某些极端事例的深入理解。一旦给某种做法贴上“洗脑”这个标签，你似乎就不用再对他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些做法的根源进行细致的探讨分析了，我们在不经意间放弃了对这些事情进行严肃思考和深入理解的责任，结果，我们本来就已经相当稀薄的智性生活变得更加浅薄。



# 陈嘉映：没有暴力支撑，洗脑会烟消云散

## 摘要

在洗脑的机制中暴力起到根本作用，没有暴力支撑虚假可能会瓦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在没有暴力情况下，我们不要轻易把反对的意见说成是洗脑的结果



## 1.洗脑：强制灌输+虚假+为洗脑者利益

说到洗脑，我估计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联想到像《一九八四》这类小说，这也是洗脑这个概念流行起来的一个源头。我估计大家都读过《一九八四》，没读过至少也听说过它所讲的大概内容。那是一本小说，不过由于我们也是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部小说离我们的现实也不是特别远，我们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有一个所谓“四人帮”，他们利用宣传机器，日夜不停地给我们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仅仅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为了能够洗脑成功，还必须同时屏蔽掉其他的信息，不允许其他意见声音。

如果有人讲了其他意见怎么办？就要动用国家专政机器把这些讲的人抓起来，或者就干脆杀掉。1966年有一个叫做遇罗克的人，他

写了一篇《出生论》，讲的是不能够因为家庭出身来确定阶级立场，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看法，但是当时它就犯忌讳了，因为它多少发出了一点点独立的声音，他就被抓起来最后被枪毙了。我提到这个是想说遇罗克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们一讲到洗脑可能会想到 1984，想到文化大革命，想到遇罗克，诸如此类。



遇罗克

我们现在把四人帮那一套宣传叫做洗脑，但在当时不是那么叫的，当时叫做**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会想教育是教育，洗脑是洗脑，怎么能把洗脑当做教育，或者把教育当做洗脑，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大家都会同意教育不是洗脑，洗脑也不是教育。

大致上讲到洗脑，会说它是在强制灌输某种或某套虚假观念。全面来讲，**洗脑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强制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这个定义里面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强制灌输，一个就是虚假，最后一个就是为了洗脑者本人的利益，这三个因素贯穿在一起构成洗脑。**

虚假好像是洗脑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如果灌输的是正确的东西，即使稍微强制点，最后成功洗了脑，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我们和教育对照着谈，我们知道教育是教给你正确的东西，这是洗脑和教育的第一层区别。

强制灌输是第二个关键，传销属于一种洗脑，建立传销的团队要给你灌输传销多么得好，然后会把你禁闭起来，把手机没收不让你自由通话。洗脑牵涉到一些强制的因素，在强制方面，洗脑看起来也和教育不同，教育是师生之间的自由交流。

第三个因素“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以传销为例子，传销的人要给你灌输一套传销的观念，那为了谁好呢？很明显是为他本人，只要他能发展20个人，那他就赚了一笔，至于你有没有赚到，那不是他关心的事。但教育就不是这样，我们教育自家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学生，当然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学生好，这样大致就能够把洗脑跟教育区分开来。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可以作为区分洗脑和教育的一个起点，之所以作为一个起点，一方面它们的确说出了一些什么，另外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些疑点，都有一些让人疑惑的地方。

我们从强制灌输说起，洗脑是一种强制的灌输，教育是自愿自主的。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第一眼看上去一方面洗脑似乎第一步都是强制，另外一方面教育中似乎总包含着一些强制的因素。

刚才讲到传销，虽然进入传销组织之后，他可能会对你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像拉壮丁一样把你拉进去，还是你自动去。比如IS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它有一整套的思想灌输给它的一些子民，把他们称为战士。欧洲中产阶级的子弟，几千人跑去参加IS组织，没有人进行强迫，他们自愿就跑过去了。再比

如说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当时是挺重大的事件，到最后我们也没听说过圣殿教教派之内有什么强制性的措施。而教育却明显牵扯到很多强制因素，很多家长让孩子弹钢琴，很少有孩子是自己高兴去弹钢琴的，大部分都是家长哄着逼着去做。

你让孩子背唐诗宋词他不爱背，他不喜欢，以前都体罚现在不让体罚了，不让体罚你还是要强制措施，可能到了大学稍微好一点，那种强制少一点，但是比如说上课要签名，不来上课就会扣学分，考试不及格吓唬你，广而言之这些都是强制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洗脑就是有强制，教育就是没有强制。

讲到虚假，我们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就是一套虚假观念。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一套2000多年的洗脑，使得成千成亿的人去信奉它。如果我们不承认基督教是洗脑的，那我想问为什么圣殿教集体自杀就是洗脑的结果，这些伊斯兰的圣战战士，自杀式恐怖主义分子，为什么他们就是被洗脑呢？为什么信基督教的人不是？

第三个方面”为谁的利益”，有一种教育确是为了孩子的利益去考量，不是为我们教育者本身的利益。现在麻烦的是有这样一种教育，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舍己救人的教育，教他舍己救人是为了他好吗？如果舍己救人受了伤，甚至生命都没有了，它的好处在哪儿呢？

## 2.被洗脑者并不知道也不承认他在被洗脑

再回到这三个方面，我还要谈到洗脑和教育另外一个区别，因为我没有看到别人谈到，所以我把它单列出来，它跟我讲的也有一定关系。这个区别就在于一般来说，受教育者知道自己在受教育，

他也承认自己在受教育，但是一个被洗脑的人并不知道他被洗脑，他也不承认他是被洗脑。换句话说说是我说他被洗脑，这并不是他自己说的，等到他认识到他在被洗脑，那么他差不多就已经从被洗脑的状态中跳出来了，就有点像做梦的人不知道他在做梦，等到他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一般是梦醒了。那么教育跟洗脑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洗脑这个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总是我们加给别人，而不是洗脑者本身得出的说法。

所以当你在说一个人被洗脑了，那么他有一种很自然的反映，会反驳你才被洗脑了。比如前段时间，有人指责自由主义者，说你们是被自由主义学说洗脑了。一般自由主义比较反对专制，比较反对强制灌输，比较强调自由教育的，可是等他批评别人没有自由教育被洗脑的时候，这些被指责的人会对他们进行一顿责骂，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成天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被人家洗脑。这时候我们就很困惑，这两种观念互不相让，你说某一套观念提供一些道理了，但是这个道理本身也很难说它就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结果的争论，甚至可以说大家都被洗脑。稍微极端点讲，其实谁不是在梦里，只不过就是做的梦不一样而已。其实专制主义是被洗脑，自由主义也是被洗脑。我们不承认自己被洗脑，但是我们后来梦醒了之后，有可能会不那么看，那么你就会看到当时我们接受的是一套虚假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吗，这件事是从来没有争论清楚的。

我们刚才讲到了教育，比如说我们就教给他们这些唐诗宋词，我们就不教给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甚至下流的诗歌，我们教给他们数学，教给他们这样的定义，而不是那样的定义。至少就部分来讲教育中明显包含着强制性，所以教育和洗脑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楚。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有的人为了显著区别二者而提出一种



主张，教育不是老师高高在上把某些真理教给学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互相交流。

我们要承认教育包含着强制，然后我们再去看洗脑的强制性。当然二者有明显不同，教育强制的程度与洗脑有很大区别。有一个成语叫做“五十步笑百步”，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听说这个成语的。长大后我总琢磨我觉得不明白这个成语，比如两个人身体都不太好，一个得了灰指甲，一个得了癌症，程度不同但是区别挺大的。强制程度有区别，如果区别够大，就是很大的区别。教育强制的程度随着被教育者的成长，这种强势性就不断缩减，缩减到最后，我们的确是可以设想一种平等自由讨论的方式进行交流。

当我们说强制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当前被强制的范围，我们要看强制以后的发展。你让学生去弹钢琴，他不想弹，你多多少少会去强迫他弹，当然他有可能就会慢慢的爱上弹钢琴，而且几乎不可避免他就必须爱上弹钢琴。可是他长大了回过头来看，他会承认你做的是对的。即使他没有弹下去，那么等他长大了可以进行判断了，他也能够理解家长，为什么当时曾经那样急切的希望他们弹钢琴。

这是一种有道理的强制，但是洗脑的情况不同。我们说四人帮把我们洗脑了，当时四人帮那样做就已经不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到教育与洗脑强制上的区别，不能完全从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来判断，而要从未来发展来判断，那时候我们往往就能更好地看到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洗脑。

我们慢慢的成长起来之后就更容易判断，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更多，我们看到的世界更广大了。换句话说，我们有了更宽的眼界。一开始就是你给我了这一首唐诗我就背，但是当我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可以看很多诗。我就不一定



要背老师选择的那首。但是如果进行一个良好的教育，那么孩子就会慢慢明确知道当时老师给我们选的诗应该还都是属于比较好的，或者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龄阅读的。这又是教育与洗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两者可能都有所强制，但是在强制范围之外就有所不同，教育者并不把全部注意范围都放在强制的范围里。你完成了功课，但很少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家长，在你做完了功课还是什么都不允许做。正好相反，如果一个好老师的话，你把功课做完，那你就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去读别的诗，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在某个程度上他受到了强制，但是由于他始终能够接触到非强制的信息，那么这个强制的部分就不会构成洗脑。

### 3.洗脑不允许你接受其他任何东西

洗脑不仅强制要求你接受，而且不允许你接受任何其他东西，后一点是洗脑与教育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教育者比较有信心，我要求你读这首唐诗，但我不怕你去看别的诗。你去看别的诗，最终你还是觉得我选的诗不错。我教给你如何做几何题，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证，但是你证完之后，还是发现老师的方法好。教育者之所以能够让学生去接触其他信息，是因为教育本身含有这样的自信，而洗脑的人恐怕就缺乏这种自信。

无论在 1984 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洗脑者使用的一个根本措施，就是尽可能屏蔽掉他所要灌输的东西之外的所有信息。刚才也谈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可能是一种洗脑。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言论自由，它可能是不断在宣传哈耶克，但是反复的宣传哈耶克并不构成洗脑，只有除了哈耶克之外什么都不允许读，那才叫洗脑。考虑到自由主义在我们这里是边缘和软弱的力量，它恐怕很难

禁止我们读哈耶克之外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难指责自由主义也是在洗脑。

我们刚才讲到，“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也许我根本回答不上来。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日本人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两者不相上下，但是我仍然要说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接近于教育，那就是他们一边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另外仍然能够允许报纸和书籍发出不同的声音。虽然有一定限制，但是报纸可以对战争进行谴责，还可以反对战争。而日本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会有其他信息的出现，但是他们甚至会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和机构进行摧毁、判刑甚至判死刑。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虽然两者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但是**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跟洗脑更接近。**不在于他们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在于爱国主义教育周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种对信息的屏蔽在一定程度上不太复杂。怎么说不太复杂呢？有一个实验，把一只猴子装在一个封闭的铁屋子里面，然后饿它，把它饿的半懵半死。这时候突然通过一个小机关往黑屋子里送几根香蕉，但是同时这个黑屋子一小扇窗户打开了。那么这个实验的目的想测这只被关在黑屋子里挺长时间同时又饥饿的猴子会干什么，反复的实验最后证明，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跳出那个窗口向外张望。对这种比较高等的生物来讲，**哪怕同时面对生存的威胁，获取信息也许是在所有需求中处于第一位的。**

获取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也能够找到一定的反例。可惜时间有限我无法细讲，但是我可以提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发生过一个巨大的运动，叫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那么思想改造有一个特点，一方面要灌输一套思想给你，另一方面还要把你的眼界屏蔽起来。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不少是留学回来的，哪怕不是留学回

来的，一般也都见多识广。也就是说他们脑子里有别的信息，但是他们怎么也会多多少少被成功改造了呢？我觉得这是思想起源问题。这个思想改造当时的确是不叫洗脑，叫洗澡。在这样思想改造背后是实实在在地搞手段。你被改造好了，或者你做出被改造好的样子，你可能就进入某个民主党派当主席、副主席，你可能就受到国务院联欢会的邀请信，你可能就当了系主任，当了教授。你改造的不好，可能职称上吃点亏，然后国务院也不会邀请你，诸如之类的，当然这还是最温和的结果。洗脑背后有着非常鲜明的东西来赤裸裸地报复你，如果你改造不好，你还抗拒改造，那么等待你的就是监狱，如果还不够，那就是死刑。

#### 4.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报复，所有洗脑手段都不会奏效

最后都是要落实到这一点上——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报复，所有洗脑的手段都不会奏效。当然我并没有说思想改造就是一场暴力活动，如果是暴力活动就没什么可研究的。思想改造非常值得研究就在于，一方面或隐或显它背后始终有暴力，但是前台上演的很少有暴力，前台有好多不同的样式，我们阅读回忆录知道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是抱着真诚的愿望参与运动，并且多多少少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种改造。

洗脑的复杂性在这里突出地显现出来。真诚和虚假，主动和被动并不是那么一分为二的。在这些微妙的场合，它们几乎永远纠缠在一起。有时候我会被威胁着去做一件事情。我讨厌你这么强迫我，可是如果条件适当的话，我也许会想办法让自己觉得：我不是被强迫的，是我自己愿意的。这帮人背后是有一套心理机制，这个机制牵扯到尊严的问题。无论如何主动去做的事比较有尊严，被胁迫是

丧失尊严的。既然已经被胁迫了，如果你们让我做出我主动的样子，那么其实还是多少保留了一点尊严。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理解洗脑的机制，无论出场不出场，暴力扮演了最“压仓式”的作用。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暴力一旦消失，哪怕减轻，那么洗脑所得到的成果很快就会断掉，乃至就会烟消云散。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叫刀尔登的出了一本书《亦摇亦点头》，写他的读书经验。他说他小时候受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用今天的话就是说被洗脑长大的。他说到了七十年代末之后，读了一点其他的书，知道了一点其他的事，没费什么劲他就把那些东西都忘了。还有像斯大林，你从小就知道斯大林多么伟大，所有都是正面的信息。有一本书，吉拉斯《同斯大林的三次谈话》，那边讲了好多国家机器的宣传，这是一本年不见经传的书，我们怎么开始信吉拉斯了，为什么不信我们的机器宣传了那么多年的东西。离开了暴力，洗脑力量不是那么大。我们就把强制和真相连在一起来说，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关于观念的争论，好像甲是一套观念，乙是一套观念，乙说甲是假的，甲说乙是假的，反正真假很混乱，怎么也弄不清楚。观念也明确的起作用，但是观念并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还有现实世界在起作用。观念再重要，它也不如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经验。不同的观念、习气不只是不同，而且有些观念就是跟我们实实在在的经验没有什么联系，空空荡荡的，虚虚假假的，但是有些观念就不是那样，有些观念是实在的，它跟你的有血有肉的经验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你洗脑后拿出的一套东西是那样的虚幻不实，你用暴力做后盾，你用开动的这个宣传机器灌输千千万万上亿的人，但是如果跟现实的这种体验和经验相距太远，那你灌输这些东西实在不会有什么持久的生命力。

现在回到第三个因素，“为了谁的好处”。我们区别洗脑和教育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谈到，到底谁赢得了好处。教育是为了被教

育者，洗脑是为了洗脑者。如果有一套观点让我们接受，那么就使得灌输给你观点的，教给你这个观点的人得到好处。比如说你交给太太“三从四德”，一家之中，总是有礼有从，当然做主的是男人，女人应该服从，那么服从，你就在家做做饭，带个孩子，别太吭气。我在外头吃喝嫖赌。如果要是我这么来教育我的太太，那你在旁边看，就觉得这不太像教育。因为一旦她接受了你的这种教育，那么倒霉的是她，占便宜的是你。那么在家庭中，在现实生活中都很正常，谁给你讲一套道理，似乎他还是有这道理，但是如果你细想就会发现一旦你接受了这个道理，他就太赚了是吧？我肯定是倒霉透了，这时候呢，你就要多怀疑，在个人关系中是这样，在政治关系中也是这样。要考虑集体的利益，政府的利益，政府也不容易，我们要看发展，讲一大堆道理讲得特别好。但是仔细一想他们过好日子了，我还在吃苦，这种道理不管他到底讲得好不好，打个问号。

关于“对谁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因为没有一种绝对很客观的“好”，所以你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受教育，你能够对某些好的东西有一个特殊的追求和好感。这种好感即使跟我们不同，甚至跟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格格不入，这并不一定说明你是被洗脑的结果。受教育本身最后也不一定都是得到一种普遍认识。当然实际上不存在从教育中得到普遍认识，你总是会获得带有偏见的认识。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发展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明明是受害者，结果他会爱上迫害者。另外一个极端，你不能说为了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极端，你就把教育说成是它会提供一套对所有人有效的普遍价值观。

如果没有完全客观的“好”，那么在教育中教给学生哪一种“好”呢？我觉得是我们当今教育工作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我们传统的社会工作中，我们大致知道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现在有一些在过去被认为是反社会的东西，到现在变成不是不能接受的，甚至



会变成可敬的。教育里面当然永远包含一部分，教师把他认为好的东西教给学生。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和孩子教育成为一个他能够形成一个独立人格，他能够判断什么是好。当你教给他好东西的时候，也不仅仅为了让他接受你认为好的东西，而是想通过这些东西培养他形成自己的良好判断力。所以教育为了孩子好，这里有一个特殊含义，不像是说天冷了我给孩子加件衣裳是对孩子好，或者孩子长大了，我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手机，这是对孩子好。但是教育为孩子好，它有一个根本的含义，就是帮助孩子自己生长，让孩子最后能够自己知道什么对他好。那么我们受了教育就不再只是懵懵懂懂地活着，我们就会有对自己的生活有所领会，在千万种可能的生活，我选择过一种生活。而如果不知道其他的生活，我只能过这种生活。

但是我在知道其他的生活之后选择过一种生活，就会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富有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好处。它富有意义可能因为它富有创造性，也可能因为我的生活能给别人带来好处。那么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生活有意义是因为你可以把这种生活献给衷爱的事业，或者献给民族国家。那么我们说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呢？如果他最后上杀场为国捐躯，还是为他好吗？这个“对他好”是因为教育让他形成了他的人格，让他形成了他的判断力。

最后我做点总结，在洗脑的机制中暴力起到根本作用，没有暴力支撑虚假可能就会瓦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在没有暴力情况下，我们不要轻易把反对的意见说成是洗脑的结果。当时我在文革的时候，都听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需要解放，可能今天朝鲜人民还是这么想，这些我们可以认为是洗脑的结果。我们把不同的意见说成是洗脑，它至少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一个坏处，因为当我们不同意某种想法，它可能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是一种罪行。如果是错误，你就要能够想办法找出它错误在哪儿，如果是罪过，



你就应该分析为什么是罪过。但是当你把这些都说成是洗脑的结果，从知性上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你放弃了你自己的责任，放弃了追踪一些错误，分析一些罪过的责任，结果我们的知性生活就越来越浅薄，我们不再认真严肃的对待一些问题。那么我就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洗脑和教育的区别，同时我们能够把洗脑限制在更确定的范围之内，把剩下的事情留给错误和罪恶的探讨去解决。

未经作者审阅。

作者介绍：陈嘉映，1952年出生于上海，后随父母迁居北京。文化大革命中到内蒙古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德语。1978年5月考入外哲所研究生，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随熊伟先生读海德格尔哲学。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2008年1月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任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

## 大陆网民讨论教育与洗脑的区别暗示不满

近日，大陆社交媒体上一篇《[教育](#)和[洗脑](#)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屏蔽异见》的文章引起网民的讨论。有网民说，“在一个国家，如果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那么这里应该掩藏着很多肮脏和恶行。”

“教育是开智，洗脑是愚民。”

长期以来，[中共](#)都严控信息传播和言论自由，“十九大”前当局发布网管新规进一步加强网络言论的控制，加强了网上监视和搜查。十九大期间中共不仅使用“长城防火墙”屏蔽国际互联网，国内上网也断断续续；大量微信、微博、QQ群被封杀，手机上网也被限制。

专家分析认为，网民因担心因言获罪，就用学术讨论的方式，隐晦表达对当局控制言论与[洗脑](#)宣传的不满。

《[教育](#)和洗脑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屏蔽异见》一文是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教授去年写的，最近他再次发表在社交媒体上。他认为，教育是通过举一反三，让受教育者有自己的理解和见解；而洗脑则是消除你的独立见解，让你只接受灌输给你的观念。

他说，洗脑有三个条件，一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编造历史，歪曲现实，日夜不停地给人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让人把假理当真理。教育的目的则相反，是要人们认识、获得真理。

二是洗脑往往是强行灌输并屏蔽掉其它的信息，不允许异见出现，更不允许它传播。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开动宣传机器，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宣传机器不停运转。

教育虽然也有强制的成分，尤其高中以下义务教育，家长不让孩子受教育是犯法的。但那也是为了让学生获得真知，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能力和自由的人格，有能力去追求真理。老师虽然规定了你必须学什么东西，他通常却不禁止除此之外你再学点儿什么，学生是自愿自主的。

三是用暴力机器压迫人接受灌输的观念，如果有异见，就用专政机器把他抓起来，或者干脆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掉。没有强权做靠山的主张，即使流于喋喋不休的宣传，也很难把它说成是洗脑。

陈嘉映指，宣传和屏蔽异见是洗脑的明面，背面是有暴力支持的。洗脑必然与强权连在一起。一个接受教育的人，通常知道自己在接受教育，他也承认自己在受教育，但一个被洗脑的人，却不知道自己被洗脑，也不承认自己被洗脑。

在社交媒体上，有网民说，中共的教育不是启迪人思考，而是规定“你必须这么想”。不是教人如何分析问题，而是规定“这就是答案”。这种教育的结果，是让人缺乏独立思考，容易思想统一，从而便于驾驭，但却聚天下英才而毁之。无良学者到处都有，但数量如此之众，就是制度问题。

# 言论自由，宣传还是洗脑？

## 1.大规模洗脑是宣传的极端手段

维基百科对洗脑 brainwashing 的定义<sup>(注1)</sup>是任何给人灌输信仰，观念的手段，以影响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这种灌输进去的信仰和观念往往和人原有的相抵触。洗脑在现实使用中是绝对贬义的，只有某人被邪教，传销之类洗脑这种说法。劝说邪教信徒放弃信仰，打破传销迷梦，这也是灌输信仰，观念，而且与原有的抵触，这种能叫洗脑吗？

这种情况说明维基百科的定义不清楚，我觉得应该修改成：“不择手段给人灌输信仰和观念”。注意最关键的就在这个不择手段上。传销培训，邪教发展维持信徒，这种公认的洗脑行为有个关键步骤，物理上或者精神上隔离被洗脑者，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一旦完成，被洗脑者即使释放到自由世界中，也因为根深蒂固的偏见，自动忽略公开抵触不同的观念，甚至主动洗别人的脑，传销就是这样滚动扩大的。

无论宣扬的是什么观念，面对面劝说，或者当众演讲，电视节目，文字媒体，不喜欢的人不愿听可以走开，关了电视机不看；但是限制被洗脑者的人身思想自由，显然是属于不择手段之列，听众没有不听的选择。

这里给了一个洗脑的狭义精确定义，不择手段的灌输信仰观念。是否洗脑与灌输的内容无关，只在于手段。隔离封闭是现在的手段，如果未来发明了直接输入大脑信息的方法，输入”1+1=2”，“饭好

吃，大便不好吃”这种不算洗脑，而输入”上帝存在”或者”上帝不存在”都是洗脑行为。

再介绍一下宣传（propaganda），维基百科定义<sup>（注2）</sup>大概意思就是大规模散布信息以影响人群观念和行为的手段。宣传是中性偏贬义的，宣传的关键是不全面的有偏向的提供信息，甚至也会撒谎。二战中盟军有各种揭露纳粹暴行，鼓励公民参军的宣传海报，当然轴心国也有相对的海报。

作为宣传手段，要为既定目的服务，不可避免的有偏向，比如征兵海报，不能把伤亡士兵的惨照放在英姿飒爽的健全士兵旁边，也不能把德军绘制的老婆偷人系列海报<sup>（注3）</sup>贴在盟军的地盘上，尽管这都是事实。

按定义，大规模洗脑可以归结为极端的宣传手段。肯定有人要问，既然是手段，那么能不能用来做正确的事情？把所有人都洗成真善美的——这不行，你怎么知道洗脑者的真善美是正确的，他的真理可能就是谬误。洗脑这种手段本身就是邪恶的，无论用来宣扬任何信仰观念。为了某种“真理”而不择手段，造成的悲剧太多了。列宁的“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不知道害死多少人命。

## 2.中美主旋律宣传的区别

非洗脑的宣传在中美都是普遍存在的，中美都有主旋律，中国不用介绍。这里举几个美剧的例子说说：《24》反恐24小时中的小强特工主角捍卫国家安全出身入死，不计个人得失，黑人总统DavidPalmer 英明果断深明大义，都是正面宣传对象。

《smallville》超人前传前两季中小超人ClarkKent 的情敌惠特尼加

入海军陆战队时，我就猜到这小子肯定阵亡，而且一定会批着国旗光荣下葬，这可是弘扬主旋律的好机会。这是典型的宣传，而不是洗脑，如果观众不喜欢尽管换台。

《24》中后任总统 Logon 懦弱无能，甚至叛国被公开逮捕；

《weeds》单身毒妈中则有片段公然讽刺征兵，女主角的小叔子 Andy 断了脚趾头也没能逃脱兵役，在军营被虐待，短期训练后即将送到伊拉克当炮灰，一次演习中军方草菅人命杀死了 Andy 的搭档，Andy 用手机视频录象和军方交易才逃出军营。这样直白的非主旋律因素美国可以公映，在中国一定被剪掉，就是洗脑和一般宣传的区别。

中国人普遍对 CNN 不满意，因为 CNN 偏袒流亡藏人，歪曲关于中国的信息，这是 CNN 不讲言论自由，当洗脑工具吗？严格来说 CNN 是私人企业，股东完全可以决定 CNN 的报道偏向，私人空间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讲？在英美欧洲的私营媒体上留言被删除不要奇怪，你不喜欢就不要看。自己办个 Anti-CNN 好了，如果足够吸引人，就能抢走 CNN 的市场。美国政府不会搞“金-盾”，在美国可以访问 CNN 和 Anti-CNN，在中国只能访问 Anti-CNN，这就是区别。

中国人不喜欢 CCTV 的很多，能办个 anti-CCTV 吗？在国内就端了你的服务器，在国外就盾掉。金-盾是隔离不同声音的墙，没有这堵墙，就不是“不择手段”，谈不上洗脑。

中美的是宣传手段高低的区别吗？任何一个反美者都会感慨美国媒体宣传的精巧手段，高明而隐晦，寓教于乐，而中国的宣传手段僵硬，虚伪，愚蠢可笑，因此归结为美国洗脑水平高，不仅洗了美国人，还有一部分中国人。

这种理解是肤浅错误的。

为什么欧美的宣传占上风？一个原因是宣传的内容，除了各国自己的爱国主义内容之外，欧美的媒体宣传的是民主宪政自由人权，这



是当代流行的东西，所谓普世价值，就如 1920-1930 年代宣传共产主义也很容易占上风。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宣传“饭比屎好吃”的难度肯定远远小于“屎比饭好吃”。怎么才能把“屎比饭好吃”灌输到人脑子里去？这就得用上洗脑这种高难度手段了，把人隔离起来，不让他吃饭，一天三顿吃屎，洗脑者不停的夸屎好吃，并且做出很享受的吃相，等到被洗脑者忘记了饭的味道，主动吃屎，畏惧饭如毒药就大功告成了。

中国的宣传，因为内容的天生缺陷，永远不可能达到欧美宣传的水准，所以洗脑成为必需的手段。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缺乏言论自由，艺术家的创作能力都被审查制度和舆论垄断给消磨殆尽了。凤凰网有个陈佩斯的专访<sup>(注5)</sup>，他把90年代以后小品电影等艺术的沦落归罪为央视之类政府控制的媒体的垄断和”政治正确”的检查，而80年代的精彩作品则得益于体制松动。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中国编剧编个类似《24》的反恐故事，敢不敢让部长级别的高官叛国，前国家主席夫人通敌，国家主席被公开逮捕？《prisonbreak》中能够让政府几乎完全站在反面，副总统毒杀总统，中国的编剧敢不敢？

### 3.言论自由的三重含义，中美之别

既然扯到言论自由，肯定会有这样的经典争论，美国的主流媒体都被大财团大财阀所控制，美国人不知不觉中被洗脑了，所以中国是洗脑，美国也是洗脑，只是程度不同。言论自由都是假的。中国用金盾盾掉你，美国则是用主流媒体的压倒优势压制不同的声音。在言

论自由这个试卷上，中国考50分，美国考90分——这仍是一种误读，因为中美根本就没有考同一张试卷，没有分数和高低程度的可比性。

怎么理解言论自由，中美之间对言论的管理究竟有何区别？言论自由类似平等和正义的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概念，可以分解为三重：

**第一，不同的言论一出现，尽管定义属性不同，应当享有同等的扩张能力，被人接受的能力。**这就如人不可能出生就平等一样，“饭比屎好吃”和“屎比饭好吃”这两种观念从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后者天生很难被人接受。

**第二，言论传播遵循同样的规则，这就是程序正义原则。**法律禁止“屎比饭好吃”的拥趸上街宣传，搞电视秀，拥饭派当街吃饭，拥屎派公开吃屎，**机会均等，规则公正，最后谁胜，让观众自己选择。**由于天生优势，一段时间后拥饭派声势壮大，拥屎派人丁稀少连电视秀都玩不起了，主流观念就这样占了上风。

**第三，言论自由的结果。**“饭好”和“屎好”两派观点相对，不管规则是怎么样，玩了多久，最后一定要“饭好”派胜，才符合人类的公义。吃屎显然不利于健康，如果吃屎派在第二层含义规则公平下玩赢了，言论自由就失败了吗？

结果的言论自由或者说言论的终点自由有很多人支持，他们觉得真理应当被宣扬，程序正义下真理玩输了怎么办？那么就干脆规定真理在规则中占优，不管怎么样，最终真理占优，或者保证真理支持者占一个比例。

林达有篇文章《言论自由的目的并非追求真理》详细的分析了这个误解<sup>(注4)</sup>。**越过了程序正义原则，只追求某种“真理”的的终点目标，在历史上造成了无数灾难。爱国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部看似真理，看似正义，但如果以此为借口打压“非爱国主义”，最终将导致一场灾难，典型的比如德国日本成为战争策源地，自取灭亡的全过程。**

列宁说的“真理前进一小步，就成为谬误”，这个“前进一小步”不是程度的区别，列宁说这句话，却不能确定这个程度是多少——结果血流成河。现在我们知道真理前进的极限是程序正义原则。不管客观真理存不存在，每个人心中的真理都是以主观形式存在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为自己心中的真理辩论，谁先破坏了辩论规则，谁就是第一个走向谬误的人。

美国的言论管理遵循第二重含义，程序正义原则。

首先言论自由在私人空间无效，无论是 youtube，cnn，fox 这种地方，乃至 mitbbs，都可以删除任何拥有者不喜欢的言论，一亩三分地，随便怎么折腾。只有市场才能制约这种公开的私有媒体，肯定有人要说，如果 cnn 找了个大金主靠山，完全不理睬顾客的倾向了，怎么办？随它去。

干涉私人空间的言论违背了私有财产神圣的原则。政府是全体纳税人公有的，政府拥有的媒体如果进入市场，这就是裁判员下场踢球，也是触犯了规则公平。所以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私营的，宣扬意识形态的美国之音电台甚至不能对内广播，因为这是政府资金支持的，不能坏了规矩。

前面一段写了，美国的言论自由，非洗脑式宣传的关键在于不能禁止 Anti-CNN，如果 CNN 老板看 anti-CNN 声势渐涨很不爽，可以出钱买下来，可以挑刺去法院起诉，也可以在媒体上讽刺，但是他不能借助专政工具，比如盾掉 anti-CNN，或者绑架恐吓 anti-CNN 经营者，或者用真理部的红头文件直接关掉。Mitbbs 网友 others 发的美国大财团控制媒体的证据<sup>（注6）</sup>，无一不在规则之内。

言论自由是有界的，美国法律限制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说，20 世纪初就产生了“清楚与现实的危险”这一判定原则，而且至今一直在进步，1918 年公开反征兵要坐牢，1969 年就不用，具体参阅

《言论自由的目的并非追求真理》<sup>(注4)</sup>。1918年和1969年判定言论的结果不同，但是规则是相同的，根据法律。无论法律的是否正确公平，按照法律执行就是。

再来看看中国呢，至今没有一部新闻法明确界定言论的范围，究竟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说，至今政府在用古代君王的御下之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sup>(注7)</sup>。如果事先公布了法律，即使这个法律是极端有利于君主的，君主也害怕刁民钻空子。君主如果按照法律行事，那么行为就可以为臣下所预测，君主的威仪和权力就受到了威胁——绝对不行。君主必须喜怒无常，恩威难测。

《财经》揭批央视新楼大火背后的腐败被中宣部整顿<sup>(注8)</sup>，你肯定想不出这是触犯了任何法律。网民发贴被审核，删贴，网站被盾，禁词表是个秘密，真理部不愿意公布。但是网民的智慧是无穷的，禁词很快就被摸索出来，并且很快发展出了一套诙谐的专用语言，和谐——河-蟹，土共——水产。“草-泥-马-现象”是网民对借反低俗整顿网络的抗议，所谓弱者的武器。结果呢，草-泥-马迅速成为新的禁词，相关视频链接一律整顿，河-蟹们肯定在庆幸，如果事先公布法律自缚手脚，碰到草-泥-马怎么办？

#### 4.管理言论有没有比程序正义更好的原则

欧，美，中国宣传的根本区别

管理言论有没有比程序正义更好的方法？直接追求结果正义必然导致为真理而杀人的疯狂。而程序正义，公平规则，自由竞争导致了舆论界的谁有钱谁声音大的不公平现象。如果公义因为没钱而不得伸张，怎么办？媒体市场上被主流打压的猛料新闻仍然有可能找到非主

流的媒体刊出，这种行为甚至可以让小报一鸣惊人，实在不行还可以网上发贴。

但如果市场也完全失灵了呢？前面提到言论自由的有界，美国政府（广义的包含立法行政司法）显然保留了对媒体的干涉能力，如果做得太过分，会受到约束。由于美国限制政府权力的右派传统，政府对媒体的干涉职能是消极，保守的，基本上只能规定不能做什么，不能指导做什么。

欧洲就比美国要左，就如经济领域欧洲普遍的福利国家大政府，欧洲人赋予政府的职能和义务远远多于美国政府，法国德国的国有电视台可以公开宣扬人权，民主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而 VOA 则禁止向美国本土广播。

经济领域，欧洲国家更偏向于结果平等，在媒体，欧洲也有点倾向于终点的言论自由，第三重含义。

德国对新纳粹是严防死打的，尽管按照美国标准，办个新纳粹网站，戴纳粹袖章不是“清楚和现实的危险”，但是德国不允许，和平宣扬纳粹也不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尽管新纳粹的言论肯定有市场需求，德国认为市场在这里失灵了。法国法院也曾判决强令 yahoo 屏蔽国外拍卖纳粹物品的链接<sup>（注9）</sup>。这都体现了欧美之间观念的差异。美国规则公平第一，欧洲则更多的接受针对言论终点的调和。“拥屎派”在欧洲的生存空间远远小于美国。

政府对媒体应该管多少，欧美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类似于公平效率之争，让左右派定期谈判调整，然后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府对媒体的操作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遵循程序正义原则。和中国的”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比比看，究竟是谁有言论自由，谁在洗脑呢？



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亲华”被停职事件<sup>(注10)</sup>引发了中国人对德国“言论自由”的质疑。这个质疑是有原因的，因为德国之声不是CNN这样的私营媒体，CNN解雇任何“亲华”记者都不会有人异议，美国国有的专职对外的VOA也根本不会雇佣张丹红这样的“亲华”记者。德国之声是国营的，对内对外都广播，这是欧洲式的政府干预的“原罪”。德国之声同时也被赋予了“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的宣传功能。既然是宣传，肯定有偏向的，在德国主流批评中国人权的声势下，张丹红跑出来说实话，比如西藏在共产党统治下确实有进步，共产党也确实做了保留藏文化的工作（虽然破坏得更多）。

二战中谁如果跑到盟军阵地上去散发“老婆偷人”传单<sup>(注3)</sup>，确实说了真话，但肯定不受欢迎。张丹红也不是无辜的，她用“在德国也不能打开儿童色情和极右翼党派网站”和“水产国包括BBC，CNN，英文wiki都要屏蔽的伟大GFW”相并提，实在缺乏常识缺乏逻辑。

三鹿奶粉事件中，网民实际形成了一场针对有毒食品的宣传攻势。在这种情况下，谁说“真话”，比如三鹿企业解决了石家庄很多就业问题，美国也有有毒食品，名为全面提供信息，实则为“反宣传”，为三鹿辩护。遭到愤怒网民的围攻是肯定的，板砖挨得一点都不冤枉。

有人说言论自由中国50分，美国90分，德法可以算80分？这是个错误的比方，言论自由执行中关键的第二重含义——程序正义，依法管理，中国交白卷，得零分。欧美有法可依，中国的七品县令派捕快入京到刑部抓记者<sup>(注11)</sup>，可谓干涉媒体无法无天。中美媒体的区别不是100步和50步，而是逃兵和坚守阵地的天壤之别。美国的媒体固然有其缺陷，但在批评0分考生的时候说实话：“人家90分的也做错了题哟！”对0分考生有什么帮助？



中国也宣传，欧美也宣传，到底有什么区别？欧美的宣传在言论自由的规则之下，中国的宣传则不择手段，无视法律，包括隔离洗脑。可惜这等手段也改不了宣传弱势的事实。

## 5.这 30 年来中国的言论自由进步了吗？

肯定有人说你看中国这些年都进步了，敢批评的人越来越多，水产党不傻，人家也在改善，不要追得太狠，总有一天言论自由自然实现。这种想法太天真幼稚了，难道这些年来言论尺度的进步是水产党良心发现改善的？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可以说是某党在文革之后的反思松动，那个时代人民日报副主编都可以是开明改良派。80 年代的人仍然活在体制之内，出于理想和体制的松动，得以发出不同的声音。90 年代收紧舆论后，今天的中国人不像 80 年代有那么多理想主义。经济制度的松动，越来越多的人活在市场经济中，不吃党的饭，敢骂的人就多起来。其实某党是很想控制起来的，胡的批示“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注 12）

计划经济下，某人桀骜不驯可以开除他的工作，吊销户口，取消口粮计划，这几招使出来立竿见影，骨头硬如鲁迅，老毛也能让他默不作声（注 13）。但是今天不一样，朝鲜保持政治正确的手段，中国现在无法全部照搬。国民党时代鲁迅活得滋润，政府拿他没办法，他住租界，就像今天的流亡人士，不过更近，随时可以回来。租界内外有一堆按市场规则运行的媒体，鲁迅就卖文为生。国民政府也很想把不顺眼的报纸都统统取缔了，不过做不到，甚至新华日报都可以在重庆出版，整天宣扬民主自由，联合政府。

今天的水产党也面临类似国民党的困局，这是经济自由之后无可避免的后果。韩寒开赛车卖书，不吃作协饭，删他的文章也堵不住他骂骂咧咧的嘴。

今天水产党还遇到国民党没有对付过的东西，互联网。网络提供了更低成本，更快速度的传播手段，跨越空间限制的联系方式，这都是前所未有的。《1984》中有类似的设想，不过是节点式的，老大哥专用来监视臣民和发布公告，发送工作内容；臣民不能用这个东西互相联系。美国发明互联网是人类文明的幸运，如果是苏联发明了internet，可能会搞成《1984》里的那个模式。

洗脑宣传必须通过隔离实现。纸介媒体可以用有形的墙隔离，互联网时代需要无形的墙，“金-盾(GFW)”可是水产党的创举。墙内请看这个论坛通知：“公安部、网监三令五申，严禁网络言论自由化！因为个别会员的闲聊贴、新闻贴、灌水贴涉及政治、两会、宗教、热门事件议论等，我们一再被机房拔网线、停机、罚款！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影视论坛，如果有会员再没事喜欢在这里谈论政治话题，我们将直接删除ID处理，请大家务必通力配合！！！”

删贴，封id，拔网线，停机，罚款，关站，抓人——压制无处不在。没有一个是按法律行事，网监给论坛管理者打电话从来不会自报家门，就像黑社会一样，“你知道我是谁”，然后就下命令。比如：“请迅速查找、删除与‘李小琳戴法国名牌围巾’有关的负面报道和评论，互动环节也进行集中清理。并将清理结果和链接地址于21时30分前报至我办，我办将组织专人复查。谢谢合作！”

借“反低俗运动”清理一批不同观念的网站，解散豆瓣数千小组。网民心中的怨气在“草-泥-马现象”中爆发出来，真理部还是慢了一步，流传热度都快过去时才反应过来。

今天中国的言论空间虽然狭窄，但来之不易。市场经济保证了不吃党饭的可能，互联网提供了快速广泛传播信息的机会，这都不能归功于水产，而是中国人自己争取到的。

现在的言论尺度大于2001年，判刑8年的“杨-子-立案”<sup>（注14）</sup>中的言论今天出现在任何一个门户网站的blog都不奇怪。现在的人更加大胆了，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多，专政机关也只能罪不罚众。现在如果谁仿效杨搞个青年读书会，高谈阔论一番，国保能不能让你入狱8年，骗取国家经费千万？不能。是专政松动了吗？不是，这么说话的人实在太多了，抓也不完。关注此类事件的网民也太多了，搞成杨佳案那样轰动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脚。

从1979年到现在，中国言论自由究竟进步了多少？如果关注于结果，确实有进步，但是程序正义这方面几无寸进，至今无《新闻法》即是明证。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今天的君威刑罚迫于客观原因减轻了，但是这不能否定未来某天突然翻脸的可能。就如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建立在专政的宽容上，随着某事件<sup>（读者评“八九六四”）</sup>发生而烟消云散。从无法到有法，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水产所畏惧的。河蟹最怕被捆住蟹腿，这样就不能横着走了。这是一个类似于大清立宪的僵局。满清政府不想制定一个限制皇权太多的宪法，这样会真的失去权力。也不能制定一个太偏向于皇权的宪法，这种“真小人”行为让立宪派不满，给革命派提供借口。形势紧迫清政府又不能永远“伪君子”下去，两难之中抛出了几乎不限君权的《钦定宪法大纲》<sup>（注15）</sup>，皇族内阁和12年预备立宪，这时候革命派已经等不及了。

如今中国人得到了比30年前更多的言论自由，也获得更多的免于洗脑的手段，这些都不是水产的恩惠，而是中国人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争来的。虽然禁词越来越多，但网民的智慧更快一步；良心犯总数未必减少，出狱的人却会发现当年判他的罪名不再使用。这让人看

到希望，但是水产还在横行，洗脑还在继续，立法保护言论自由尚无真正的进步，前面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 12. 胡锦涛朝鲜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时的讲了苏联如何转变成现代民主国家，以及如何防止中国转变成现代民主国家的经验教训，他说：“其中有一条，就是苏共上层领导的政治腐败，地方基层党组织名存实亡。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解决好执政基础，完全可能执政不到70年，甚至在更短时间垮台，国家前途要败在我们这一代。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搞垮苏联和苏共的主要手段是从意识形态入手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说到底，是其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而绝不是所谓的「功臣」，说他是「功臣」，那是没有站在苏联人民和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讲话。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这是苏共内部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 13 毛主席谈”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此文出来後，经当时在场而且在世的黄宗英证实。

## 15. 《钦定宪法大纲》1908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四、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

五、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六、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八、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九、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

十、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

十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

十二、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

十三、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十四、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附臣民权利义务（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

一、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二、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等事，均准其自由。

三、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四、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五、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六、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七、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八、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九、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 林达：言论自由的目的并非为追求真理

我们在中国想言论自由，认为其作用是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普遍认知水平受到局限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任何人以“民主”的借口扼杀思想扼杀真理，或者干脆谋杀了那个口吐真言的倒霉蛋。所以，才必须有言论自由。言论所表达的思想，是最丰富最无从把握的，其发展是与人类共存亡的。也就是说，只要人类还存在下去，就没有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谁也不能仗着人多势众就不准别人开口。如果把这个问题用通俗化的简单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在中国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一条是：“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

一般认为，在整个美国宪法修正案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句，即“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简称“不得立法”条款，是美国宪法和宪法修正案的灵魂。

直到我踏到美国的土地上，我还以为，美国人把言论自由看做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因为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理解：正是为了保护在任何时间空间里有可能存在的“潜在真理”，所以，才不给任何人



以绝对真理自居，并且迫使别人服从的权力，或者像我们以前熟悉的说法，真理越辩越明。

可是你一定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美国人心中的言论自由，与真理不真理根本不沾边。美国的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关键就是：言论自由与真理完全无关。

其实很多国家的宪法都有言论自由这一条，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那么，美国的权利法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它的特点就是规定了政府不得立法剥夺这种自由。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借口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或其他任何非常状态，去剥夺或限制人民的宗教，言论及出版自由。为什么呢？就因为美国人对于这些权利的理解与我们当初的理解大相径庭。

他们认为，这些自由是基本人权，即，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如言论自由，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跟发表言论的这个人是不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这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也毫不相干。哪怕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哪怕假设有一种方法，可以鉴定出他的思想不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对是谬误，他作为一个人，还是有权利说出他的想法来。说出来，是合法的。

一般情况是，最积极地呼吁言论自由的，都是在某一阶段处于少数、不利地位的政党、团体和个人。他们总是相信，尽管自己当时处

于劣势，声音微弱，但是真理在手，必须呐喊。尤其当他们的言论受到压制的时候。他们之中也许有一些人真心相信，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成为多数，他们会非常自然地推崇言论自由。他们在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在宣扬自己的主义的时候，自由常常就是他们宣称的目标和大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过无数先例，情况经常是相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言论自由总是在事实上仅仅成为争取胜利的工具和手段，一旦获胜，就常常被有意无意或是无可奈何地弃之如敝履。

这种情况究竟为什么一再在历史上重演呢？究竟是走到哪一步就出了岔子呢？言论自由的关键是什么呢？我想，关键就在于它的“内容中性”原则，就是要把“真理”二字坚决地摒弃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

只要让“真理”二字一不小心从门缝里溜进来，言论自由就完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呼吁和宣扬言论自由的人们是很容易上“真理”的当的。他们或是明确认为，或是在潜意识中，总是觉得言论自由是走向“真理”的一条“阳光大道”，觉得言论自由只是让真理“越辩越明”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概念的指导下，一旦走到自己感觉已经“真理到手”的这一步，言论自由被抛弃就成了十分顺理成章的事儿。

只要不坚持“言论中性”，只要以为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那么，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终有一日，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

在美国，“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是划得非常清楚的。在这里，这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希望到了某一天，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

对于美国宪法修正案最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几乎从一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挣扎在两难之间：既要维护言论自由的承诺，又惧怕言论引起的非法行为以及煽动的暴力，甚至担心危及国家安全。因此产生了最著名的，对所有宪法条款都有效的“清楚与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如果政府无法证明某一言论是造成了清楚与现实的危险，它就不能对该言论的发表者进行惩罚。这条原则产生在本世纪初。

但是，新的判断困难随之而来。什么样的程度的危险算是危险了呢？危险的可能性到什么地步算是“清楚”了呢？离危险相距多远就算是“现实”了呢？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发现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非常顶真，已经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大概对于他们来说，人命关天，马虎不得。或者更确切他说，个人的自由事关重大，不得马虎。

由于这一类问题本身的模糊性，也由于“自由言论”在美国的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使它在美国的发展带有很鲜明的历史印记，几乎每一次重大案例的确定都反映了大的社会变革。在早期，美国的最高法院依据一九一七年的间谍法案判案时，对于自由言论的理解还是非常狭

窄的。例如，在一九一八年，一个曾四次以社会主义者身份竞选总统的工人领袖，尤金.V.德布斯，就因为站在大街上公然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宣传社会主义而入狱，罪名是煽动不服从，非忠诚和叛变，煽动拒服兵役和阻碍美国征兵。

五十年代，还有一些涉及美国共产党的案子。我们都很熟悉，在共产党的思想体系里，要武装革命，暴力推翻政府，这和夺取政权是很合逻辑的事情，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些案子里，则竭力试图将直接组织暴动和宣传暴动分开，因为根据宪法，对前者联邦政府有权干预，而后者却属于信仰范围，政府就是不满意，也只能干瞪眼。一九五一年，美国最高法院还认定美国共产党领袖有阴谋颠覆政府罪，但到了一九五七年，最高法院在判案时观点已经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推翻政府”，更像是在宣传一种信仰，也就是说它所可能引起的“危险”，并不是非常“清楚”和“现实”的。

到了一九六九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布朗登堡案的时候，重新规则了“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它规定，只有当一个言论所宣传的暴力，有可能直接煽起“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时，政府才有权干预。在这时，整个美国社会也已经变得非常宽容。在我刚刚提到的尤金.V.德布斯被判刑的五十年后，人们再回顾这个案子，已经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在六十年代，煽动反越战和宣传不论什么主义，都已被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了。这也是六十年代黑人能够取得民权运动胜利的基础。

这种历史的巨大进步，和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条款时，所作出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以及规定这种“危险”以“迫在眉睫”为标准，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只要是对美国政府不满，或是呼吁大家起来反对联邦政府的某项政策的言论，都很难逃脱“颠覆政府”的罪名，更不要说像美国共产党这样公然主张“武装斗争”的政党，也赢得一席合法地位了。有了以上的原则和标准之后，美国几乎杜绝了以言论获罪。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所得到的收获不仅仅是自由，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地下的秘密政党，因为不再有这个必要。“政党们”发现自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站在大街上，宣传自己哪怕是要大家起来“暴力革命”的主张，这样，也就没有了某个“地下政党”和美国联邦政府作“地下斗争”的所有惊险故事。所有与这种故事有关的血腥气也就都不存在了。当然，美国联邦政府也因此省了很多力气，它乐得摆出一副“无为而治”的样子。大大小小的政党们也就全凭自己的“本事”了。民众是任凭你去“呼唤”的，就看你“唤”得起“唤”不起了。

权利法案在两百多年来的实践中，它简洁的条文必须面对复杂而且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它纸面上的立法必须逐步打破甚至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势力（如种族偏见），去真正确立人的尊严。它不断受到不同时代特点的挑战，而且在将来肯定会遭遇更为严峻的考验，人们为此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会一次次动摇自由的信念。所以，

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